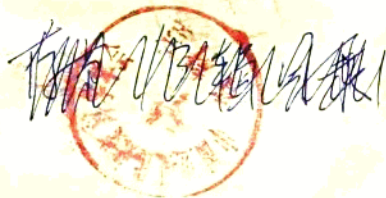


28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说 明

解放前，甘肃省的经济状况是十分落后的。为了给研究我国现代史和甘肃地方史提供资料，并使青年一代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旧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在新旧社会制度的对比中，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本辑收入了有关解放前甘肃省工商、经济、税收、交通及工会运动等方面的资料共十二篇。除个别资料系根据当事人的口述整理者外，其余均为当事人所耳闻目见和亲身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作者林知渊先生已经谢世，王化机老先生以八十三岁高龄，亲自执笔给我们撰写了西北公路史料，尤为难得，特致谢忱。

本辑所刊资料，如有错误或遗漏，欢迎读者提出补充订正。

目 录

从辛亥到解放前夕的甘肃织呢工业·····	徐慧夫 (1)
解放前的甘肃电业概况·····	胡应德 (17)
中国工合运动在兰州·····	焉寿先 (27)
中国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略述·····	马公瑾 (46)
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	严树棠 李建基 (55)
兰州骏川成水烟厂·····	马鹏程 (73)
水烟史话·····	张慎微 (83)
我在兰州天福公钱庄的经历·····	郑立斋 (88)
解放前的兰州直接税·····	李建基 (97)
甘新公路首次整建纪实·····	秦诚至 (110)
西北公路局概略·····	王化机 (121)
西北公路运输总局琐忆·····	林知渊 (159)

从辛亥到解放前夕的甘肃织呢工业

徐 慧 夫

甘肃的织呢工业起源于左宗棠任陕甘总督的时代，第一批织呢机器是向德国订购，于一八七九年运到兰州，同年九月开始安装生产，当时从工程师到技术工人全系雇用外人。织呢厂称为甘肃织呢总局。厂址设在当时通远门外前路后营旧址，即今日的畅家巷内。开工以后，生产情况不佳，机器坏了无从补修，又且帝国主义洋货充斥，产品没有市场，随于一八八三年停办改为洋炮局，将部分机器改造军火。直至一九〇九年彭英甲任兰州道台时，又聘请比利时技术人员重新开工，但仅仅办了两年，又再度停顿。直至一九一四年张广建任甘肃督军时，才又重新开工。本文根据一些老工人的回忆，就张广建开始恢复织呢局起，至一九四九年解放为止的甘肃织呢工业，作一简略的叙述，以期有补于旧中国甘肃工业史的研究。

张广建主办的织呢局

辛亥革命后，由比利时技术人员经办的甘肃织呢局，早于彭英甲参加反革命的攻陕军时已经停工，结束了对洋人的雇用合同，并予以资遣。比利时籍的穆费（工程师）、那班瓦（纺线工，对中国工徒打骂得最厉害的一个）、勒那（织机工）、黎克（拉

毛工）、瓦能克（染呢工）、克拉亚（检修机器工）等六人取道宁夏离开兰州。

一九一四年张广建督甘。他为了装门面，便派蒯寿枢为甘肃织呢局总办，力求恢复改观。这时，曾在比籍工程技术人员手下干过的徒工周占魁、罗福林（纺线）、赵有才、刘炳炎（织机）、王海林、李逢春（整染）、颜永禄（锅炉）等人，便全盘地接受了任务。这是甘肃工人第一次自办织呢工厂，虽经工人们最大限度地努力，而产品因受外货排挤销不出去，存呢竟值银币十万元之多。

次年，蒯见经营惨淡，资金周转不灵，便认为机器陈旧（没有精纺设备），中国技术人员不行，又向甘肃当局建议说：要搞好本省织呢生产和与外货细呢竞争，必须重新添购最新式的纺织机器和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当局研究后，决定将现有产品积存，以待昂价；并从每年财政收入项下预支二万八千元，以便三年之后，大举恢复扩建。可是几年荏苒已过，预算的款项非但分文没有，就是当时积存的粗呢，也只减价拍卖了七万余元。更可笑的是，在这笔存款中，当局又拨出一万五千元作为别用，加上给看守织呢局职工的薪水开支，最后只剩下两万多元了。这样，蒯寿枢的所谓远大计划便幻灭了。

邓隆、牛厚泽经营的甘肃制呢公司

一九一八年甘肃官府和社会上层分子中又有人提议说：“咱们放着左宗棠购置的外国纺织机器不搞官办，但也不组织民办，这不是太可惜了吗？”甘肃当局认为这一建议很好，于是指示实业厅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该厅认为商界有钱，于是联系商会，请

其招股接办。但是兰州商人是深谙织呢局的屡次真正倒闭的原因是质粗价高，产品滞销，深恐再蹈彭英甲、翻寿枢的复辙，故无一人敢应。一九一九年固原伊斯兰教大教主马光烈来兰，闻知此事后，便很惋惜地说：“左宗棠当年创办织呢局，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现在这样的废弃了机器，太可惜了！”接着他便与实业厅联系，建议官商合办，并由邓隆筹备恢复事宜。

不久，有人又在省议会提出最好“民办”。而实业厅则偏向初议，双方矛盾，不可开交。恰巧这时马鸿逵之父马福祥来省，邓、马系小同乡，又有反正前共同筹办光明火柴厂的旧谊，故由马出面向实业厅及省议会调解，初步确定由邓隆与牛厚泽招股商办。

为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先交代一下邓、牛来历。邓隆，字德舆，甘肃河州（今临夏）人，清进士出身，光绪年间曾做过四川南充的知县。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邓因母丧回甘，充任过官商合办的光明火柴厂总经理。因其宦囊有积，对染指纺织业兴趣正浓。牛厚泽，临洮人，为一旧民主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曾做过乙种工业学校和甘肃工业学校校长。当时这两个人凑在一起，经过磋商，便决定招股成立甘肃制呢股份有限公司。由邓负责对外联系，以总其成；牛管具体业务、设计产品。正当邓奔走经营之时，实业厅却提出必须事先验股，方能移交机器。这是因为马福祥返乡前曾与该厅商妥，原织呢局的机器及厂房租金，均按商办全年营业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十左右计算。当然，股份越多，投资越大，营业收入与租金必多。否则，他们深恐邓隆虚报股份，将来所获租金甚微，徒损公家机器而已。这样，邓只好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到马福祥再回兰州时，才再次出面交涉，由实业厅办理了移交。

甘肃制呢公司开办之初，邓德舆与牛厚泽便以主要力量生产各种羊毛驼毛粗纱，并积极组织人力分赴各地推销，以供应广大人民编织毛衣、毛裤之用。据说，邓德舆决定用此法获得大量利润后，再有计划地生产粗呢，并添购外国的精纺机器设备。果然，邓的这一办法甚有成效。稍后，公司又与西藏喇嘛寺联系，订销大批粗呢。因此，有一个时期，公司不但白天加紧生产，还开夜班。接着，并陆续生产一批毯子与栽绒毯。这些产品，同在邓、牛所办的商店应市。由于营业颇有起色，公司便进一步研究减低产品成本的办法。邓、牛认为，每天生产用水数量很大，而且这些用水，时刻都要用马车从黄河运输，如果能将厂内的硷水井加以改良，则可以节省大量资金。恰巧这时赵元贞先生由美国学习冶金专业回来，邓便邀赵到公司参观，并提出改良厂内井水的要求。经赵慨然应诺，采用石灰化合物予以解决。

随后，邓将公司所产的呢子不畏运输困难，运往上海推销。及至抵沪以后，但见物美价廉的洋货充斥市场，优劣相差很大，急忙将呢样藏起，随将这批产品在上海减价大拍卖了。

从此，各帝国主义的细呢、毛毯，逐渐流入兰州市场，甘肃制呢公司的价昂、质粗的产品，便更加进入滞销状态。公司为了继续维持，便组织职员通过各人的社会关系，大力向亲友劝销。赵元贞、杜志清等先生，当时都买下一条价值四十块银币的栽绒毯子，质地结实耐用，解放前曾使用了数十年，完好无缺。

大约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公司经营更趋惨淡，邓德舆眼看再无力维持了，便向马福祥呼吁求救（因马系股东之一）。邓、马商妥，将公司所存呢子用羊皮筏子由黄河运往绥远（时马任绥远都统），由马收购，充作军用。但结果马只付税款及运费开支，致使公司损失过大，即行倒闭。马、邓、牛三人因此翻脸。

据颜永诚回忆：“公司是怎样倒闭的？当时工人不大清楚。只记得临关门的前几天，邢督工（牛厚泽的亲戚）来到我们梳纺车间说：‘牛先生和邓先生闹别扭，公司要停办，你们赶快把机器的重要零件藏起来，散股以后牛先生准备招股再办’。这时，工人们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自然希望再复工，于是便把重要零件偷偷地卸下，藏在大梁上。但是，牛以后也只打雷，不下雨，始终再没有把公司恢复起来。”

说到公司对待工人方面，当年的工人们怎么也忘不掉资方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当时干活时间为“时对时”（从早六点到晚六点），工资极低。并且规定旷工一天，扣薪三日。因此全厂一百多工人，备受痛苦。有一个时候，工人们看见邓监工（邓隆的侄子）和邢督工（牛厚泽的亲戚）来了，便开机操作，等他们一去，便关车休息。特别是那个邓监工随意打骂工人，群愤甚大。有一次，他用板子抽打纺纱工赵恒，赵忍无可忍，含怒反击，将邓一把推倒，压在身上，挥拳痛殴。林某等工友一见有了出气的机会，便你一拳、他一脚地乱揍起来。直打得邓监工告饶不迭，方予停手。事后公司方面不答应，逼赵向其赔罪，才算了却。此外，工人刘林，有次因为锅炉漏水，使用工具拧紧螺丝，但因机器过旧拧不动，他使用力拔铁管，不料用力过猛，铁管一经拔出，里面的开水便向喷泉似的直射出来。除将在旁的领工徐德盛两臂烫伤外，刘竟被烫得露出骨头。经抢救送到医院，但当时兰州的医院设备太差，药物奇缺，对患者束手无策，甚至无法为患者止痛，刘只能呼痛号叫，一直到死。

国民军入甘后的军用甘肃织呢厂

一九二五年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入甘。次年年春，刘郁芬派马瀛岑再次恢复织呢局，以为军需之用，并改称甘肃织呢厂。马瀛岑是山东人，曾学过纺织，为人思想较新，待人、接物、处事不坏，他对工作小心谨慎，积极负责，常到车间与颜永禄等工人聊天，最讨厌懒惰、偷摸和吸食大烟。当时厂内仍用原有的机器和厂房设备，职工共计120多人，其中有女工四、五十名，专搞拣毛工作。每月工薪待遇比较清末民初都要好得多，一等工银币18元；二等工16元；三等工14元；四等工12元；五等工10元；六等工8元；学徒六、七元不等。以面粉价值计算，每元可以购买40斤左右，解决了工人饥寒交迫的生活问题。同年端午节，马还向全厂工人宣布，每人发生产奖金五元。可是到时刘郁芬的财务处不同意，于是马便亲自去找该处的处长杨耀东，终于实践了他的诺言。马领导工人有一套比较高明的办法，故工人个个精神抖擞，加劲生产，所织呢子坚实匀密，所产驼绒毯质量可与俄毯比美。这些产品除供国民军军用以外，也有部份产品应市销售，当时呢子每公尺售价银币三块多，绒毯每条五块多。

由于马瀛岑经营得法，工人积极性较高，在掀起生产高潮时，工人颜永禄向马瀛岑保证说：“咱们的锅炉爱出麻搭*，影响生产。我这次一定要修理，管好这个烂货，教它听我的。”果然，在生产闹得红火时，锅炉始终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呢子的产量，最高峰曾达到每天生产10匹左右。

* 麻搭 西北地区方言，意即故障、毛病。

但是，正当冯玉祥的国民军刚刚办好织呢厂的第二年春天，河州便发生了马仲英（人称尕司令）的反冯战争。因而马骥岑与颜永禄等工人都被派往押运子弹，故仅仅办了一年的工厂，又告停产了。在停产时，厂方给工人发了两个月的工薪，声言随后即行复工。但是两个月后还不能复工，于是再补发工资半个月。以后，工人再去，厂方说：“没钱了”，冯玉祥以后也再没有把织呢厂恢复起来。

国民党时期的军用兰州制呢厂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军政部第一制呢厂简述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国民党部队因为长期执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故与日军一经接触，望风逃窜。因此沿海工业，俱为敌有。一九三七年冬，因为军需必要，国民党军政部便指派该部武昌制呢厂厂长蔡德明率工程技术人员张和巢、孙铎（均系留法学生）、王庆霖、赵凤岐、王德有等二十多人前来开办军政部兰州制呢分厂。这时，甘肃主席是朱绍良，他已事先接到伪中央的电示，故在蔡等于一九三八年二月抵达兰州后，即令甘肃建设厅予以接洽。经双方研究后，决定将左宗棠在清光绪二年（1876）创办的织呢总局的机器、厂房租借给军政部，并援武昌制呢厂的成例，月租定为伪法币400元。

当蔡德明与工程技术人员接收织呢局时，该局的看门老人赵秉坤把大家领进去一看，只见机房的门窗破烂不堪。起初都疑为日机轰炸，询问老人，方知几年前因附近的火药库爆炸把织呢局弄成这个样子。及至打开机房一看，机器上的尘土足足有一寸

厚，而且发现机器上的油泥均系菜油，故而零件磨坏极多。可见旧政府办工业何等腐败。

甘肃织呢局的机器设备，先后从德国和比利时买来。清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致函上海道台胡光墉（家严）代为购买纺织机器，从德国购来梳毛机三套、走锭三台（各360锭）、织机20台、24匹马力和32匹马力蒸汽机各一部、锅炉一部。其他如洗毛、染色、烘毛、拉毛、压光等机器均有。到了一九〇九年，兰州道台彭英甲恢复织呢局时，除补充原有机器之毁坏零件外，并添进少许设备，如一台走锭机，系彭由比利时买来。从此以后，一九一四年甘肃督军张广建再办织呢局，一九一九年邓隆、牛厚泽经营的甘肃制呢公司，一九二六年冯玉祥国民军所办的织呢厂，都是利用原来的设备，并无丝毫扩充，仅利用旧有设备加以整理，草草开工而已。

军政部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接收该局后，从武昌前来的技工，便积极投入了擦洗和检修机器的工作。因为人力不够，又在兰州当地招收工人，力图迅速生产。经过五个月的恢复工作，方于同年七月一日正式试车。但是，由于机器陈旧，试制的产品不能达到合格要求。又因厂房及建筑远不如武昌制呢厂优越，故再经与甘肃当局交涉后，租金减为每月250元。从此甘肃织呢总局便改称伪军政部第一制呢厂，并正式投入生产。

伪军政部制呢厂于一九三八年九月正式开工后，专作军毯。这种军毯，长二公尺、宽一公尺半，重约一公斤，均系灰色，日产六十条。经棉纬毛，质地粗糙。当时国民党腐败无能，并无化验、试验等设备，亦无检查标准。此后才渐次将细毛拣出，织成少量呢子，设色多用英、美、瑞士的酸性媒介、直接染料。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进口染料困难，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中国土

法，以槐花籽染绿色，用橡壳子染黑色。再后，还搞了少量商品呢子应市，计有红、绿、藏青各样品种。

从武昌来到兰州的技术工人，大多数都是由华北和上海战火中逃出来的，这些人为了全家老少吃饭，在武昌投入伪军政部的厂子干活。来兰以后，他们仍在饥饿线上挣扎。技工赵凤岐，曾经在北京清河织呢厂干过多年，当时论技术，他被评为一级工，但每月只拿伪法币40多元（只能买200斤混合粉），一般的工人拿得更少了。因此携家带眷，备受饥寒。学徒除吃饭外，每月的工资只能到街上吃两碗面条。甚至连曾在法国留过学的工程师张和巢，也因工资低微，不能养活老婆娃娃而离职别就。该厂因系军事系统，工人上下班经过大门时，都必须由威严凶恶的警卫搜身，如防小偷一般。但是，与此相反，厂长蔡德明除自己纠集股金创办“兰友实业社”搞投机倒把外，并与厂内的王清林、张相等入互相勾结，集体窃盗公家大量钢材，在兰州城内的小沟头开了一个铁工厂，专门制造机器零件和其他铁器，分饱私囊。张相还给蔡做过开饭馆的生意。不仅如此，据老工人伍寿奎说，蔡还在兰州南关投资开设妓女院。因被同伙告发，终被革职。一九三九年日机轰炸兰州后，蔡娶了一个妓女做姨太太，带着大笔贪污款项，跑到甘肃的岷县开矿去了。

蔡德明任职期间，他想贪污厂内库存的大批机器零件和铁器，以便供给他们贪污集团开办的铁工厂作为原料。于是由厂方函告甘肃当局说，这些器材都破烂不堪了，可以作为废品报销。但是，蔡的这个建议却惹得朱绍良大动肝火。朱并不知道蔡的贪污阴谋，只是认为军政部既系租用省方公物，随意便宜处理库存物资很是不妥，饬建设厅派阎寿乔来了解情况时，因蔡的贪污尚未成事实，且厂子又不属甘肃地方所管，蔡德明便故弄玄虚地对阎寿

乔说：“我们租用贵省的机器，并不是马上就生产的。这些使用了几十年的老玩艺，真是快到报废的时候了。经过我们检修和添配新零件，现在才能勉强使用。你看！这些从机器上卸下来的锈毁东西，简直是徒占库房。你们如果需要，请马上运走，我们还要放别的东西哩！再说，你们不让报销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租期满后，也可以将机器上的新零件卸下，不予移交。”经蔡这么一说，阎自然觉得颇有道理，便倾向蔡的建议，声言回去报告朱绍良。果然，不久朱绍良便以“姑予照准”的批示满足了蔡的贪污企图。这样，蔡便在合法化的情况下，窃盗了国家的大批资财。

一九三九年冬，日机两次空袭兰州，把伪军政部的制呢厂炸了个乱七八糟。据赵凤岐说，在平时，工人一上班，便先到厨房抓几个馒头，以免防空时饿肚子。可是可恶的厂方规定：如不发出紧急警报，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当时因为工人身强力壮，跑得快，幸免于难。但是，织机车间的机器和厂房全被炸毁，其他车间也有不小损失，门窗都被震碎了，生产立即陷入瘫痪状态。

正在这时，伪军政部又派陈汝昌（留法学生）来接替蔡德明的厂长职务。蔡因丢了乌纱帽，也不管生产问题了，于是厂子等陈来后半年，才于一九四〇年夏天恢复生产。

工人们当时觉得来了个留过“洋”的厂长，要比蔡好一点。其实这个陈汝昌比蔡德明贪污更凶。他除与兰州织布商李少堂勾结营私舞弊，并在西关开设了一个陈记绸缎庄外，又将赃款投资到何家庄兰友实业社（包括纺织厂和铁工厂），大做投机倒把的买卖。陈的这种贪污行为，早被工人发现，但在万恶的旧社会，只是敢怒不敢言。与此同时，也有人将陈的不法行为密告伪军政部。因之，何应钦曾专电谷正伦予以核实处理。但是谷因这个厂

子系军政部管辖，又推脱了回去。于是何便让军政部派员前来调查。但陈善于钻营，仅由厂长职务变为总工程师，仍然逍遥法外。

除了蔡、陈这两个大贪污犯以外，其部下的孙连庆、关天力、田云祥（人称田大个子）、李××等，都是蔡、陈豢养下的走狗和工贼，镇压工人的打手。

田云祥（田大个子）是蔡、陈一条忠实的走狗。这人穷凶极恶，诡计多端，平时对待工徒，如防小偷一般。夜间常常潜伏在工人宿舍窗外，监视工人言行。有一回他因此竟跌在水沟内，在工人中传为话柄。又有一回，工人正在上夜班忽然停电，大家高兴的笑出声来。谁知田在外偷偷监视，他听见笑声，便从黑暗中拉住工人就打，并气势汹汹地说：“哼！我就知道你们又在偷东西哩，笑声是给贼娃子打暗号呢！”学徒姬进禄有次因线头没有结上，便被打得昏了过去。

李××是个封建把头，大伙称呼他“宝爷”。此人是打骂工人的最高纪录创造者。有一次因为试验用三个汽车发动机驱动机器，毒打了郭耀西、鲁青义等好几个工徒。他打工人的耳光，还不准挪动，鲁青义因为怕痛退避，他越打越凶，把鲁打得在车间乱转。还有个学徒因为挨了他五十多板子，手心肿了起来，好些天都不能干活。工人如上班迟到，开饭时，他便将饭厅大门一关，围着工人乱打乱骂。李的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激起了工人们的极端愤恨。

关天力和孙连庆。前者系厂内的总务科长，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解放后即由人民政府逮捕法办。后者系伪军官（厂方为了加强对工人的监视，将其任命为机电车间主任，离间分化工人。他们在一九四七年的工人罢工中，都曾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当时，工人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兰州抗战前夕白面一百斤售

价为法币11.16元，到了抗战胜利时，已涨到了180,000元，增加了好多倍。工人吃的是冷馒头，喝的是烂菜汤，有时甚至连开水也没有，工人只好喝点蒸馍馍的蒸锅水。至于穿的，更是破烂不堪，形同乞丐。厂方警卫森严，进出都要严格检查。由于工贼的迫害，工人毫无人权，有个姓张的工人和一个名叫三宝的工人，被工贼诬陷，送交伪第八战区司令部，按军法处理了。

因为反动派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残酷地吮吸工人的血液，所以不能不激起工人的反抗。有一天，伪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要来厂参观，厂方为了向谷献媚，特将一名上夜工班的技术高的工人罗世忠调成白班，但是罗不买帐。厂方恼羞成怒，不但不让他到饭厅里吃饭，并将其囚禁在灶房附近的一间小房中。不仅如此，反动派还放了深及膝盖的水，有意将罗折磨。此事被工人赵双喜、常玉华、徐福贵等发现，率领工友拿着木棍、毛条鞭等前往放人。在工友们团结一致和强烈抗议下，厂方才被迫释放了罗世忠。工人们终于获得了胜利。

伪军政部与甘肃省合办制呢厂

一九四一年冬，有个刘益远(陕西宝鸡申兴纱厂主任)来兰，谷正伦认为此人是办纺织业的内行，请他在参观兰州毛纺织业以后，多多提些改进的意见。刘在参观伪军政部制呢厂以后，便向谷提出改进该厂生产的办法多项，特别是那个能提高产品八倍的说法，最能触动谷的心弦。于是谷经过一年多与何应钦的交涉，于一九四三年将该厂改为伪军政部、甘肃省合办制呢厂。当时共投资500万元，双方各认一半。

改组后，厂方以40万元购进锅炉一部，建筑了几十间房子，这恐怕是甘肃织呢总局在辛亥革命以后最大的一次扩建了。但仅仅办了一年，就因为通货恶性膨胀，厂方领导(此时由原会计张

文海任厂长)营私舞弊,产品质量粗劣不堪。因之应市产品竟连私营企业都竞争不过,故而资金周转不灵,亏本甚大。这时,谷正伦原想捞一把的美梦幻灭了。遂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仍改归军政部制呢厂,租用省方的机器和厂房设备,定为期限五年。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被服厂制呢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将伪军政部制呢厂改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被服厂制呢厂,组织及业务归被服总厂领导,经费及员工薪资由西北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拨给。与此同时,张文海去职,由佟寿勋担任厂长,金坚为副厂长。一九四七年春、夏间,佟调总厂当厂长,金即为制呢厂正厂长。金接任之初,工人因不堪厂方的残酷压榨和生活所逼,便爆发了春、秋两次罢工。前次是当年二三月间,梳纺车间有个学徒到饭厅去吃饭,因菜完了,发了几句牢骚,伙食管理员便殴打这个学徒工,并予软禁,扬言准备按军法处理。工人闻讯后,便由张富广等人一拥前去质问,工人们愤怒地说:“你们不放人,我们就不开车!”在工人们浩大的声势下,没有相持多久,厂方被迫释放了这个学徒。后者是当年秋天,有个陇南籍梳纺工人(曾做过小学教师)串连工人向金坚写了不具名的报告,质问工人为什么与职员福利待遇相差如此悬殊?并把相同内容的宣传品贴在工务科的门口。由于工人前一天作了周密的布置,所以在罢工当天中午,除了机电车间由于孙连庆(伪军官)的拉拢外,全厂工徒都集合在操场上,准备将伪厂长金坚和大队长×××抓来,据理质问,展开斗争。不料消息被金坚获悉,便临时夹着尾巴逃跑了。正在大家气愤的时候,伪总务科长关天才欺骗工人说:“诸位,有事好商量,你们先上工吧!”与此同时,厂方便作了反罢工的严密布置。次日,厂子的周围和房顶上都出现了荷枪实弹的武装

人员，在机电车间也部署了电网，恐怕工人破坏机器。这时，罢工的组织者（那个陇南籍的梳纺工人）乘机潜离。封建把头孙连庆便集合工人们说：“这次罢工是谁带动的？你们好好说出来！不然，就要枪毙！”但是大家均报以沉默和仇视的眼光，没有一人开口，这天晚上，厂方便把张富广、杨建民等六人开除。在此期间，反革命分子关天才又加紧在夜间监视工人，对童工横加打骂。金坚因为受到这次严厉的教训，以后对工人就不得不稍微好一点了。例如当一九四八年物价又趋上涨时，菜金很少，大家吃不到菜，金便在外边设法买些萝卜缨子。又因为伪法币不断贬值，职工领到的工资，几乎等于废纸。因为此事涉及到厂方和职员本身的利益，金便设法在伪第八补给区事先领薪，买成粮食，等到发薪时，按钱折成实物，尚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到了一九四九年春，金坚调任被服总厂厂长，制呢厂厂长由总工程师汤挺生（留英学生）继任。这时全厂有200多工人，日产机制军毯100多条。所有产品归联勤总部调拨，专供蒋帮打内战之用。有时，亦生产少量黄色军呢，供伪长官穿用。

由于厂方很少向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童工魏空璇（仅16岁）因挂天带惨死。当他的尸首还挂在半空中时，可恶的领班吴朝元不但没有半点怜悯之心，反而指着尸体大骂：“他妈的！谁叫你上那里去。”工人们看不过眼，便由徐福田上去将魏抱下来。反动派玩忽人命全无心肝。有个炊事员拿了库存的一个机头，转交工人高凤和去卖，不料在曹家厅寄卖所寄售时，为厂方侦悉，便将高凤和逮捕，除压杠子、施电刑外，并送交总厂审处。有一天，高在总厂趁看守人员疏忽，换了一套军装，意欲混出大门，不幸又被发现，因而再次经过一番严刑拷打后，被判刑送到监狱。